

【城市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态链”与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规划策略

杨贵庆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社会生态链”这一概念较好地解释了人群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有助于解释社会关系中集团利益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结构稳定或失衡的原因,可以解释货币具有缓解社会链接冲突和矛盾的重要作用,并揭示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分布特征。“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对城市空间多样性具有相应的要求,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需要多样性的城市空间来承载。基于“社会生态链”理念,规划策略应加强对城市空间现状的调研和评估;注重传统城市空间“斑块”的保留和功能转型;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以承载多元社会结构;适当运用小街坊划分方法,增加小尺度公共空间;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体现多元社会集团利益。

关键词: 社会生态链; 城市空间; 多样性; 社会价值; 规划策略

中图分类号: C912.81; TU9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60(2013)04-0047-09

一、“社会生态链”概念及其理论价值

1. “社会生态链”的概念

“社会生态链”(Social Ecological Chain)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以各种需求进行交往而组成的动态、多元、暂时或长久的社会经济链状结构”。这一概念笔者早先在2000年出版的《城市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曾提出过。^①目前用“百度”对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其结果除了出现上述章节中的相关内容之外,尚无其他相同词条。这一方面说明此概念尚未被广泛运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它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社会生态链”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相互关系的结构模式,并对研究城市空间特征及其多样性规划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社会生态链”这一重要概念,这里有必要引用一段当时观察这一现象的场景:“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某一城市,有一私营五金灯具商店的老板与客户做好了一笔买卖,但商品较多,店主顺便叫来在路边停靠的货运人力板车的拉车人。店主付给拉车人10元钱,让他把货送到客户指定地点。这样,这个过程就暂告结束。”^②

这虽然是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城市中十分普通的一幕,但笔者发现这一商品购买活动过程的表象之下,存在一个清晰的“链状结构”,即:客户自己(或代客户的雇主)购买灯具,付钱给店主;店主从其他地方批发(或自己买来原材料生产),在店内再零售或批发,做出了智力或体力的劳动;拉车人出卖体力,衔接了这一送货的需要。这是一条完整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图1所示)。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中,不同的人群组织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如果借用生物学物种种群“自然生态链”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这种链状结构称之为“社会生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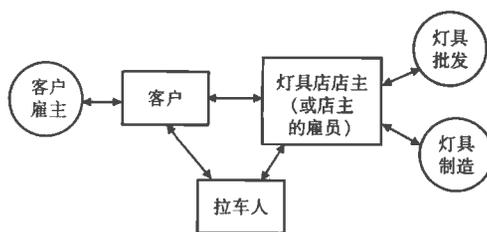


图1 购买灯具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生态链”图示
(图中矩形和圆形的区别在于,三个矩形所发生的活动在本文故事中是在同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

收稿日期:2013-05-15

作者简介:杨贵庆(1966-),男,上海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

①、②《城市社会心理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页)第三章“社会心理学的拓展理论”第四节“人际交往理论”中论述了关于“社会生态链”的概念。

“社会生态链”所揭示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不同于“生产关系”概念中所揭示的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后者是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产品的所有权和劳动过程中地位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注重的是生产过程。而“社会生态链”概念的重点是人类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因活动的性质不同而使得链状结构的特征也不同。换言之,社会经济链状结构因活动特征而发生变化,因活动变化而呈动态转换,因活动结束而断裂,因活动持续而长久,并且因活动的复杂性而呈多元状态。

虽然“社会生态链”概念来源于对社会经济活动个体行为的观察,但是,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集体行为。行为个体所代表的身份归属,是“社会生态链”这一概念的重要运用价值所在。换言之,“社会生态链”呈现的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基础上的集体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行为个体之背后所反映出的诸如“店主”、“客户”、“雇主”、“富人”、“穷人”、“低收入家庭”等集体名称,才是社会关系结构模式的抽象表达,并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因此,“社会生态链”结构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或人群的集体概念。

此外,集体行为的“相互关系”一定存在特定的连接纽带或方式。如果说生物种群的“自然生态链”具有其特定的法则,从而实现了生态平衡,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态链”也具有其特定的连接纽带或方式,反映出相应的社会约定基础,例如特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环境下的社会规约、法律或宗教信仰的要求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特定的连接纽带就是货币。换言之,货币是“社会生态链”这一链状结构中连接各个节点(利益群体)的纽带,它最为通用、恒定,并且相比之下最具有信誉和效率。

2. “社会生态链”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它解释了人群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尽管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活动类型纷繁复杂,但是从复杂多样类型的表象下,都可以抽象出这些人群之间的相互联系。换言之,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体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类到相应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属性之中。在经济活动中,用“产业链”来抽象出经济活动中相互关联产品及其利益群体的纽带,而“社会生

态链”则是社会关系结构模式的形象表述。

(2) 它有助于解释社会关系中集团利益的相互作用。任何个体行为都是相应集体概念的具象表达,因此,大量的、重复的个体行为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相对应的集体行为的逻辑关系。而那些代表特定集体行为的集团利益,在“社会生态链”的链状结构中得以实现。在现实社会中,某个集团利益正是通过这种链状结构模式的交往,和其他利益集团建立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3) 它可以解释社会结构稳定或失衡的原因。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是社会结构不稳定或失去平衡的具象表现,其实质是“社会生态链”链状结构中连接的环节或节点本身发生了破坏。进一步的推论是:“社会生态链”线性的链状结构出现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两个节点之间只有一个连接关系,而当这个连接受到破坏,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或群体即发生冲突对抗,无法进行有效的关联。而相比之下,网络状的链接结构相对稳定。因为在网络状的结构中,由于每个节点(利益集团或群体)同时与多个其他节点建立相互关联。当某一段连接关系受到破坏,但由于其他连接关系尚在,并通过它们传递资源和信息,从而使这一破裂的状态获得了弥补和重新连接的宝贵时间,因而增加了避免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整体的社会结构关系不会马上遭受破裂(图2所示)。例如,当企业主和劳工之间只有这一对链状结构时,一旦他们之间利益关系产生矛盾,将迅速导致对抗和冲突。这时如果存在第三方诸如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那么,对抗双方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第三方得以协调而存在修复的可能,进而减少甚至避免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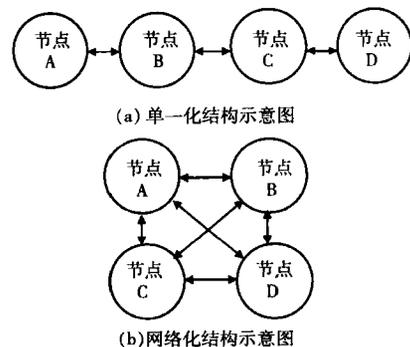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生态链”单一化结构和网络化结构比照示意图

(4) 它可以解释货币具有缓解社会链接冲突和矛盾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下，“社会生态链”结构关系中各节点之间实现诸如产品、服务、能量和信息等物质或非物质的传递和交换，其中最为通用、恒定并具有信誉和效率的纽带是货币。因此，当链状结构发生失衡或受到破坏时，货币可以作为修复失衡关系的重要工具，对利益缺失的一方进行补偿，从而维持“社会生态链”的继续存在。例如，在旧城改建中，政府、投资者、原居民是三个最为紧密的链状结构中的节点。假设被拆除房屋的用地将作为规划中的地铁站点进行建设和综合改造，主要是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规划目标；而投资者除了投资建设地铁站点之外，还将获得综合商业建设的工程及其效益；当被拆迁的原居民的居住利益受损时，给予居民货币补偿的满意程度将成为顺利实现项目实施的重要因素。相反，链状结构遭到破坏而未得到修复，拆迁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冲突激化，将导致相应的群体上访等事件发生。

(5) 它可以揭示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和分布特征。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具有相应的空间尺度。同样，“社会生态链”结构关系中任何节点及其链接状态，一般都会对应于特定的空间表达。当大量、重复的个体行为在空间上不断聚集而成为一种规模化的集体趋向，那么，特定的城市空间也就出现了。例如，当某个地方成为商贩交易的日常汇集地，那么“市场”就成为这一城市用的主要性质。因此，这种特定的城市空间就具有了社会属性，它成为围绕“市场”这一目标的各种相关利益集团或群体的集聚地。由于“市场”有

交易商品类型和价格层次的分类，因此，不同类型、不同价格层次的“市场”就分布在不同区位的城市空间，从而形成不同收入人群的活动集聚地。和以上商业行为相类似，城市的居住行为、工作行为等都存在“社会活动”和“城市空间”相互对应的特征，再加上城市在地形地貌条件和历史发展轨迹的特殊性，因此就能反映出某一城市独特的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布特征。

在以上关于“社会生态链”理论价值的讨论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认识到“社会生态链”的理念对于达到实现社会结构多层次和多元化的重要性。根据上述的讨论，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原有的“社会生态链”之链接关系遭到破坏而导致破裂。社会集团利益的高度聚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隔离甚至极化，而极化的社会分层更容易导致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线形的“社会生态链”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连接是单一的、脆弱的。一旦链状结构中的任一链接破裂，社会将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受到剧烈影响；而网络状的“社会生态链”形式具有更为多元和稳定的特征。因此，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和多元化，对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

以下本文将重点讨论“社会生态链”理论价值中的多元结构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即：如果网络状的“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它对城市空间有怎样的要求？对此，城市空间的规划应采取怎样的策略？

二、“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对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诉求

1. 自然界生态平衡中的生物多样性的启发

正如上文所述，“社会生态链”的概念受到生物学物种种群“自然生态链”的启发，相应地，生物多样性对“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也具有重要的启发。

首先来看生物多样性的意义。“自然生态链”的生态平衡，得益于物种种群的多样性。即：多样性的物种种群对维持食物链起到重要作用，任何物种的灭绝都将对食物链乃至生态平衡产

生不利影响。这一共识使得人类对自然界物种及其环境保护具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范围内都在呼吁对濒临灭绝的物种进行抢救和保护。自然界物种种群的不断灭绝，是导致当今世界范围内自然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并使人类担忧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地球只剩下人类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物种，那么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将不复存在，而这必将导致人类自身的灭绝。因

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述的自然法则对于“社会生态链”的结构模式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换言之,自然界的这一原理和规律也应该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系统本身。把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原理运用到对人类社会结构的研究,我们可以建立“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概念。所谓社会阶层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内部,具有多种类型、层次明晰并且相互关联的人群阶层。人类社会阶层多元化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之间共同的本质特征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结构具有更为依赖的相互关系,它避免了单一性之间的对立、隔离和冲突。相互对立、隔离和冲突正是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产生矛盾、争夺甚至战争的主要根源;而相互依赖正是人类社会实现互助和谐的重要社会基础。

因此,“社会生态链”的链接节点越多元、越丰富,那么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就越有促进作用。前文已经讨论过网络状的链接方式对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缓解具有积极的意义。这里更进一步指出,链接节点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是社会平衡的重要基础。它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社会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群体多层次、社会阶层多样性,对于社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及其代表的阶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定位和发展的机会,那样,人们会是安定的,有梦想可以去实现,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去达到目标。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秩序必将是稳定的、积极的。即便是有矛盾冲突,社会多元模式的链状结构也将通过其他相关联的利益群体去沟通协调,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相反,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单一的,社会阶层简单,那么,当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时候,难以形成调和,则容易发生更为严重的冲突和暴乱,以至于彻底打破社会平衡。例如,当一个社会只剩下“富人”和“穷人”这两个社会阶层(链接节点)的时候,贫富阶层之间差距严重,社会对抗行为的结果则会导致“社会生态链”的断裂,引发激烈的冲突。而如果一个社会在富人

和穷人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同程度的中产阶级层次,那么,社会问题和矛盾可以被达成的协调所化解,客观上有助于抑制社会冲突的发生。

2.“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实质上是社会生活丰富性的印证

人类文明的进程和社会劳动分工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从游牧状态转向定居成为可能,而定居在根本上促进了围绕居住而衍生出的居住文化。人类社会第二次劳动大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定居生活的精细化过程,并促进了城市文明的诞生和发展。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呈丰富性和多样性增长,社会职业群体和阶层变得多元。可以说,“社会生态链”的多元结构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城市文明的进程和产业类型的发展及其职业人群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一致性。从以农业和采掘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到各种工业门类的第二产业,再到以商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城市文明的逐步发展进程,即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组织程度进步的结果。产业类型的丰富性导致了从业人员的多样化,并使得不断集聚的产业类型和职业人群在城市空间上具有一定规律的分布,使得城市土地使用类型和空间类型具有相应的特征。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提升了城市的魅力,促进社会阶层多元化,并反过来吸引更多人将之作为居住地的选择目标。一般来说,某个城市的社会阶层的分类越多,那么这个城市的吸引力就越大,吸引前来定居的人就更多。这是因为,多元的社会阶层让不同的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和发展的机会。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大都市上海具有较大吸引力的原因,是和这座城市具有多元社会结构是分不开的。在“喜欢上海的100个理由”的访谈节目中,被询问的人群来自各个社会阶层^①,他们的职业类型和收入水平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各自喜欢这

^① 2010年新浪网投票评选的“喜欢上海的100个理由”中,有外滩、新天地等沪上景观,也有刘翔、姚明、张爱玲、周璇等上海名人,更有来自不同阶层人士对在上海定居、就业的感受。

座城市理由。上海大都市既可以让世界五百强顶尖企业发现商机,让日进斗金的富豪找到奢华消费的感觉,也可以让贫困的新移民找到落脚的地方和发展的希望,甚至可以让街头流浪汉和乞丐找到谋生的方式。无论从职业类型和收入水平上来看,不同人群都可以并愿意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作为一个成熟发展的城市所应该具有的多元社会结构,换言之,多元社会结构对城市文明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过,“社会生态链”的结构类型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计划安排,经济活动具有规定的秩序。而经济活动的秩序也影响并促成了相应的社会活动秩序,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是有限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更多的市场选择导向,而丰富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应的社会生活必然促进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3.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需要多样性的城市空间来承载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活动需要空间载体。当今互联网络中的网购和虚拟社区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虚拟的网络空间和速度支持,而传统面对面交往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则需要具体的城市空间来承载。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具体的物质性的城市空间。

“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下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必然需要相应的多样化的城市空间来承

载。社会阶层多元化要求城市空间(主要指建筑外部、建筑之间的公共空间)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作为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换言之,城市空间以多样化的形态承载了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活动,从而使得社会人群活动具有属于他们的空间场所,并实现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而这种人群活动内容本身又进一步构成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

从我国城市建设历史来看,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反映在多样化的城市空间形态之中,早在我国北宋初期就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北宋突破了之前坊里制和集中设市的制度,即城市商业经营无须在特定的地点集中设置,允许沿街开店,经营也不受时间所限。因此,城市经济活动蓬勃发展起来,也使得城市布局形态和结构呈现出多样类型。同时,北宋东京(开封府)的住区格局废弃了唐代棋盘式的坊里制度,道路系统不再是规整的方格网形式,沿街设店经营、居住和商业混合使用等特征已初见端倪;建筑顺应河道,街市活动与河道交通运输、埠头商业贸易活动相结合,这种景象不仅呈现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也可以从名著《东京梦华录》^①中感知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精致程度,以及这些丰富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联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北宋时期开启了我国城市土地混合使用的历史,展现出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相互关联的生动画卷,反映出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特征。从北宋开始,城市居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赋予了城市空间的多样化形态特征,距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

三、“社会生态链”理念下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规划策略

基于上述对“社会生态链”多元社会结构与城市空间关系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空间多样性的社会价值及其重要意义。即:多样性的城市空间具有承载社会多元结构的积极作用,它对建构网络化的“社会生态链”具有无法替代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我们应当

不仅要重视既有多样性的城市空间,而且要在规划新城、新区方面注重多样性城市空间的塑造。在“社会生态链”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规划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对城市空间现状调研和评估,深刻领会既有城市空间的社会价值

^① 《东京梦华录》详细描述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公元1102-1125年)的城市风貌,包括城市内的王公贵族、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反映了北宋都市丰富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它和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场景珠联璧合、相互映衬,是当时城市社会生活多元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多样性的真实写照。

城市空间形态多样性是社会生活多样性的物质表达。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背后隐含着相应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业内人士也许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一般都要绘制“土地使用现状图”和“土地使用规划图”。如果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做比较,可以看到现状图中的地块通常都比较小而且布局零乱,道路网可能支离破碎,不成系统;而规划图中的用地则比较大而且整齐,按照规范重新划定的道路网十分规整。在土地使用规划图中,除了新规划地块大而整齐之外,那些原有小而散乱现状地块也大部分被重新规划的大色块覆盖。长久以来,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规划就应该这样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新的规划成果。然而,细一想会发觉,那些原有小而零乱布局的用地背后所反映出的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被规划的“大手笔”清除了。那些记载着旧城区历史变迁丰富信息的、混合功能的细碎用地,以及它们之间空间关系的结构所赋予的城市特征,被崭新的、单一模式的规划所覆盖了。

我们今天看到有不少城市规划方案中采取简单、整齐划一的大地块进行规划布局,暂且不论主观的意图如何,在客观上正在驱赶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或者说从城市空间规划上限定了社会生活多样性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助推着单一模式“千篇一律”地翻版复制。因此,城市规划布局需要深层次考察土地使用的现状特征,规划布局应采取更为精细的对策,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规划策略,反映并尊重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内涵。

2. 注重传统城市空间“斑块”的保留和功能转型

不同规模尺度的传统城市空间在城市中宛如一个个“斑块”,镶嵌在现代城市功能结构之中。这些“斑块”既承载了当前的城市功能,也反映了历史文化的内涵,是城市社会生活丰富性的生动体现,也是“社会生态链”的重要节点。这是因为,这些“斑块”的形态背后,是长期以来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生产等城市活动的空间轨迹,记载了城市发展的历史事件,它蕴藏着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丰富的信息。而正是这样的丰富性,才使得这个城市土地使用的形态呈现出

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并赋予了建筑在土地使用形态基础上的城市空间多样性,也才使得这一城市具有和别的其他城市所不同的个性特征。

传统的城市空间“斑块”有的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场所,也有的是平民化的公共空间。对于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场所,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事件赋予了它独特的内涵,从而具有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意义的代表性和象征性,并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得这些城市空间更加具有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对于那些平民化的公共空间,它们对于城市居民具有特定的意义。尤其是长期在此生活的居民,那些城市空间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是生活功能内容的载体,也是社会网络、记忆等精神生活的载体。

正是因为传统城市空间“斑块”的重要内涵,其历史文化和社会内涵的多元价值应受到重视。在规划策略上,采用多样化、渐进式改造和更新的方式是可取的。反之,那些不顾原有城市空间的社会网络,采用“推土机式”的大拆大建的方式需要反思和摒弃。历史上曾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西方城市美化运动,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显示着统治阶级权利的力量。在本质上,这种影响并不是西方或者东方城市所特有的传统,而是集权统治自身的传统。城市放射轴线和几何图案所形成的强烈秩序感,和权威与统治的特征不谋而合。即,权利与政绩的表达需要直观和快速,而简单、整齐划一的大地块规划建设模式正符合上述的要求;相反,对原有建成的现状进行精细化的更新改造,则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投资。但是,如果从对待传统城市空间更负责任的意义来说,规划应遵循审慎的原则。城市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阶层多元化和城市空间多样化之间建立的这种联系,要求我们更为谨慎地对待城市空间的历史遗存,避免单纯权利与政绩的空间表达。以创造性的思路,规划设计更富有社会意义和属性的城市空间。在这方面,上海老城厢地区的“田子坊”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图3)。如今“田子坊”这一街坊成为上海知名创意园区之一,传统街巷亲切宜人的尺度受到各类创意人士的青睐,而当地居民通过出租房屋获得房租收入,原有的街道加工厂厂房改造成为稍大规模的设计

机构,这里已经成为创意产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人群聚集活动的场所,而具有传统城市空间特征的街巷成为支持这一特定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对于上海大都市来说,这一具有特色的城市空间“斑块”,成为上海城市多元化社会结构的重要体现。而如果根据原有规划,要将该地区进行规划重建,按照高层住宅小区模式将传统街坊“推倒重来”。但是正因为后来发现了创意产业对这一街坊功能的转型和复活,使得规划建设停止了原来在东侧大尺度新建高层住宅的计划。从图中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街坊东南角两幢新建高层住宅的模式向西推进,那么“田子坊”就不是今天这样多元生动的社会经济活动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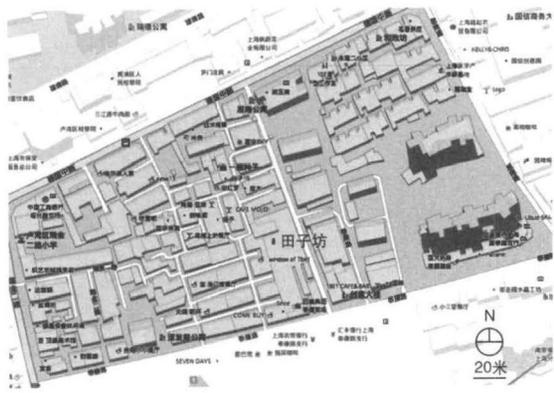


图3 上海“田子坊”传统空间肌理(西侧)与大开发模式(东南角)的对比

资料来源: <http://map.baidu.com/newmap=1&shareurl=1>

3. 提倡土地混合使用,承载多元社会结构

土地混合使用是体现城市空间多样性的重要规划策略之一。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使用性质基本上是单一的用途。城市用地性质一旦确定,则不允许作为其他用途。随着城市建设环境的变化,一些用地确实需要改变性质的,则在我国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中引入了“兼容性”的规定,但是,对于土地混合使用性质的编制办法却一直没有被突破。

从历史发展来看,土地使用的功能分区具有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而产生的诸如环境污染和居住条件恶化等城市问题,呼唤出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要求。1933年《雅典宪章》把城市的基本功能确定为生产、生活、交通和游憩4个方面,每个功能区块的用地布局相对集中。这样做最直接的效果是,工

业区生产所导致的污染可以被防护绿地隔离,使得居住生活环境安全卫生。在现代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下,城市用地形态特征呈现出结构的相似性。诚然,功能分区对于合理组织生产生活、防止工业污染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功能分区规划需要依托强势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这正好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但是,随着城市现代工业本身的发展、后现代工业的崛起,信息产业等生产力要素的革新,城市社会生产呈现出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例如,现代电子信息和通讯产业发展,一方面使得产品创意设计和生产制造区可以分离,另一方面也使得“居家工作”成为可能。工业化背景下城市功能分区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以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为标志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模式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它倡导“人与人的交往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理念,城市土地使用功能的混合反映出人们交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和多元的社会生活,受到自下而上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推动,在城市土地使用形态和空间结构上塑造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因此,土地混合使用是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客观反映,也是承载多元社会结构的物质环境基础。

然而,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土地混合使用的思想在具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受到一定阻碍。这是因为混合使用的土地产权性质难以确定,直接影响到产权的年限。例如,在地铁车站附近规划建设城市综合体,其中除了商业等公共使用的性质外,还融入了住宅单元。那么住宅产权的年限和商业的不一致,导致在产权性质方面与出让土地的性质难以一致。土地混合使用管理法规的缺位,导致现实操作的困境。因此,关于土地混合使用的法规亟待研究制定,以便促进城市社会生活多元结构的融合。

4. 适当运用小街坊划分方法,增加小尺度公共空间

我国城市空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用地划分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新建城市街区来说,新建道路网结构基本奠定了城市用地尺度。我国城市道路网规划中的主干道、次干道网络密度一般有一个合理间距的控制,例如我国城市干道间距一般控制在600米至1000米左右。在这

样的干道间距划分下,虽然可以做到道路网密度的合理性,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用地尺度的雷同,并导致大尺度街坊的用地,间接地促成了城市空间的单一性。因此,在城市总体道路面积密度保持合理的前提下,通过不同宽度的城市支路形成路网体系,便于小街坊划分城市用地,增加小尺度公共空间,从而使得丰富的社会生活得以在空间上承载。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教授曾在一次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的主旨发言中指出“小尺度邻里生活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①。他论述道:小尺度的公共空间、街巷等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社会空间联系的模式。他批评当今中国一些城市改建过程中对小尺度社会生活空间的清除并取而代之以大尺度、大规模的建设,集中了高层办公楼、巨型商业广场和大马路等,虽然方便了机动车交通,却不利于步行活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非商业化的小尺度公共空间,例如邻里公园、小广场和街角空地等,界定了人们社会生活的领域,它们是由普通居民通过长期的口头交流而定义的,赋予了这个城市一张人性化的脸。通过它们,人们得以从抽象的物质空间环境中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家园。他建议规划师应当采取更好的方法来应对城市规模增长所面临的居住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加以铲除。约翰·弗里德曼对于小尺度公共空间的理解,充分体现了城市社会生活内涵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而小尺度公共空间正是多元社会结构的重要物质载体。因此,在规划策略上,一方面应充分重视既有城市物质环境中的小尺度公共空间,尽可能加以保留和改造完善,提升其物质环境条件品质;另一方面应在规划新建的城市用地中,合理布局小尺度公共空间用地,为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创造条件。

5. 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过程,体现多元社会集团利益

参与规划过程意见及其决策,是社会各方体现其利益的最好途径。只有通过充分的公众参与,规划建设的结果才能使得各方利益诉求的最大化实现。然而,由于我国现阶段城市规划编制缺少有效的公众参与,使得规划方案不一定真实反映现实发展中居民的特定诉求,那些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就难以体现。

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仍面临较大挑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快速规划建设的需要,难以真正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现状用地调查需要工作时间,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更新改造规划则更需要评估和论证。相比之下,简单、整齐划一的大地块规划模式要简便和快速得多,这既满足了委托方的需要,也比较符合规划设计机构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追逐经济效益的工作模式。此外,新一代年轻规划师自身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体验不多,再加上项目周期短,他们在规划方案中,往往被要求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几平方公里、甚至是几十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难以深入细致地表达规划对象的特征内涵和多样化需求。(2)公众参与的途径有限,即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了解规划过程。当前规划编制过程中除了进一步做好专家评审论证的必要环节之外,还应当加强规划过程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在方案编制完成之后的法定公示时间内接受公众的意见,而且应当在规划方案形成过程中吸纳多方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3)公众关于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的基本知识有限。在这方面,我国各级政府规划主管部门需要加大专项资金和人力投入,推进规划基本知识的普及和规划法规的宣传,使得公众在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时提高针对性和参与效率。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社会生态链”的概念对于解释人群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同时,它还有助于解释社会关系中集团利益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社会结构稳定或

^① 2007年5月19日在同济大学召开了以“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为主题的“2007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板块中作了《小尺度空间的城市》的主题发言。

失衡的原因,并进一步解释货币具有缓解社会链接冲突和矛盾的重要作用。此外,它有助于揭示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分布特征。

“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对城市空间多样性具有相应的要求,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需要多样性的城市空间来承载。如果说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城市社会来说,“社会生态链”的链接节点越多元、越丰富,那么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就越有促进作用。

“社会生态链”多元结构实质上是社会生活丰富性的印证。社会生活丰富性促进了城市的魅力和社会阶层多元化,而多元社会结构对城市文明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社会生态链”的结构类型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更多的市场选择导向,丰富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应的社会生活必然促进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基于“社会生态链”的理念,当前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规划策略应注重加强对城市空间现状调研和评估,从而深刻领会既有城市空间的社会价值;注重传统城市空间“斑块”的保留和功能转型;提倡土地混合使用,承载多元社会结构;适当运用小街坊划分方法,增加小尺度公共空间。此外,还应当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体现多元社会集团的利益。

(文中图3由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宣文同学协助绘制,致以谢意!)

参 考 文 献

- [1] 杨贵庆. 城市社会心理学[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
- [2] 曹洪涛.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 [3]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 [4] 吴志强,李德华. 城市规划原理[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 [5] 杨贵庆.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机遇和风险——“2007 城市发展国际论坛”述评[J]. 城市规划学刊,2007,(4).
- [6] 杨贵庆. 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城市批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Social Ecological Chain”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Diversity of Urban Space

YANG Gui-q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ocial ecological chain, which well explains structural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human social lives, also helps to expound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stability or imbalance of social structure. It not only explains how currency eases conflicts in social connections, but also reveals social attribute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ce. The multivariate structure of “social ecological chain” demands diversity of urban spa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 ecological chain, some planning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more surveys on and assessments of current situations of urban space, reservation of “patches” in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mixed use of land to embody multivariate social structure, using small blocks to divide land use and expand small-scale public space, and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the benefits of multivariate social groups.

Key words: social ecological chain; urban space; diversity; social value; planning strategies

(责任编辑:曾 静)